

## 战后美国宏观经济学发展过程的一些特点

### SOME FEATURES OF AMERICAN MACRO-ECONOMICS DEVELOPMENT PROCESS AFTER WORLD WAR II

樊 纲

编者按：为了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中国的经济理论急待发展，这是有关各方的共同呼声。

由于制度、背景和国情迥然不同，中国和美国经济学各自所谋求的目标和要解决的问题自然也极不相同。但若就经济学本身而论，在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某种共同的科学性、规律性的东西可资借鉴呢？本刊正是抱着这种目的，在这里发表樊纲同志的文章，介绍战后几十年美国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些特点。读者可以注意到，作者在分析、归纳中是有所思、有所发的；提出的问题，与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例如，如何理解理论的实证性与规范性的关系，如何理解理论的抽象性与实用性的关系，如何理解政策分析和理论研究的关系，如何认识流派之争与理论发展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学发展中正遇到的重要问题。希望此文能引起从事经济理论工作和关心经济问题研究的各方同志的兴趣。

战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说是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形成开始的，从此经济学理论在西方也由“一门课”演化成了“两门课”，“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这两部分理论，除了一般所说的研究对象的差异外，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宏观理论是以经济现实中的各种“非均衡”的或“不和谐”的状态为背景的，如失业、危机、通货膨胀等，并以解决这些问题为目的。尽管近年来也有人想用“均衡市场”的方法来建立宏观模型，但目的仍在于要解决上述各种难题。而微观理论则仍沿袭新古典理论的“均衡传统”，即主要以个人和企业的最大化行为为背景，研究经济的各种均衡的或和谐的状态，目的在于阐明各种市场机制本身的运行方式及其结果。这就是说，经济现实中均衡与非均衡、和谐与不和谐的两个方面，也

表现为理论上两个部分的分离。而这种分离的进一步发展，则形成了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美国经济学近几十年来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沿“两极”发展：一方面，已经过几代人精雕细琢的微观理论，由于其基本理论问题已经解决，因此除了在对风险、公共商品、不完全信息等问题的分析上加进了一些较为具体的因素之外，整个理论的发展，主要就是如何引入更新、更现代的数学概念和方法，使其更加一般化、抽象化、动态化。例如，对一般均衡理论各种问题的数理论证，便是这种发展的最大成果之一；加之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微观”问题，本来就是由企业和个人自己而不是由经济学家们去解决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这门学问的发展趋势可以说是离实际问题越来越远了。而在另一个极端，则是宏观经济学与现实的

樊纲 (Fan Gang)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联系日益紧密,在理论本身的抽象性、系统性逐渐加强的同时,理论的实证性也更加突出。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理论与现实的“滞后时差”大大缩短。理论的形成,一般是要落后于现象的。在经济学的历史上,这种滞后往往很长,如资本主义进入经常性、周期性的危机几十年后,西方经济学中才形成了凯恩斯主义这样一个较能自圆其说、较为系统地解释危机现象的理论。而凯恩斯理论的出现,也在方法论上给了经济学家们以重要的启发,再次告诉人们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及时地、实证性地去承认、反映和解释现实,为此甚至要不惜牺牲旧有理论的“理论美”。战后几十年来,本来就较多实用主义、较少经院习气的美国经济学家,这方面的“自觉性”显然又有所提高。纯抽象的理论推理在美国宏观经济学界不是没有,但从抽象到抽象,没有任何“政策含义”的理论确不再多见。理论家们竭力竞争的,主要还是在于如何更准确、更及时地将经济现象理论化、模型化。例如,70年代后美国经济出现了“停滞膨胀”现象,原有的“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反向替代关系显然无法解释这种失业与通货膨胀同时增长的新现象。但没过多久,货币主义者和合理预期学派的理论家便提出了“增广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将6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长期执行凯恩斯主义扩张政策所导致的,人们对通货膨胀进行事先估计这一现象加以理论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付出更高的通货膨胀代价,才可能减少失业。又如70年代中期国际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同时美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持续下降的情况发生后,很快便出现了风云一时的供给学派理论;尽管这个学派的理论后来被认为过于偏激,难为大多数人接受,但受其影响,整个经济学理论却得到了迅速的“改造”,长期被忽视的供给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技术变化、资源变化的影响,很快在宏观理论研究中受到重视,成为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理论与现实的联系日益紧密,还表现在对理论的经验计量验证已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40年代开始,以库兹涅兹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帮助美国政府逐步建立、完善了国民经济的统计核算体系,使各种统计数据的搜集、整理更加合理、详尽、系统化;同时他们也利用已有的数据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的数理统计研究,通过对经验数据的分析,来检验或修正各种理论。从此以后,计量分析及其现代工具“经济计量学”,便成了整个宏观理论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任何新理论的提出,都需有计量分析的支持

和证明;尚未被充分证明的理论,则往往只能被称为“假说”。50年代就已提出的“永久性收入”或“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至今仍在被人们从各方面加以检验,故而仍继续被称为“假说”。一般的经济学论文,现在都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理论,即阐明理论的内容、建立理论模型;第二便是对该理论进行统计计量的分析和验证,这往往占很大的篇幅;第三是阐明理论的“政策含义”。没有计量证明的理论是没有人接受的;而有了计量证明自然使理论更有说服力。当然并非任何计量验证都很可靠。许多复杂的问题,很难以计量验证的结果定论;同一组数字,往往不同的人可以算出不同的结果;有的人为了证明一个理论,有时也不惜在技巧上搞些小花样——“让”现实去符合理论。因此经济学家们自己对这些计量结果也是持“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态度的。但计量实证成为理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仍不失为宏观经济学的一大进步。

另一方面,在理论更加注重反映现实的同时,理论研究本身的重要意义也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单纯的对策分析已很少见,没有较系统的理论分析为后盾的政策也已难为人们采纳。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形成之前,某些现代通行的经济政策也曾被采用过;因此有人曾认为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出现,先于凯恩斯理论的出现,主要的例证便是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但近年来的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有理论依据的政策和无理论依据、出于偶然或权宜之计考虑的政策,是有本质差别的。因为后者往往只考虑到问题的某些方面,而前者却能顾及复杂经济现实各个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这种差别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无理论依据的政策不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且往往“下错了药”。最严重的例子便是30年代的大萧条。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已普遍同意这样的分析,即当时的危机之所以如此深刻、持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1929~1933年危机已很严重的情况下,政府及联邦储备局采取的却是货币紧缩政策,结果造成“人人想借钱而借不到”的情况,使萧条愈演愈烈。战后初期,尽管没有出现严重的政策错误,但由于政策仍无系统的理论为依据,一方面是偶然性很大,例如1948年的减税,是在经济高涨时进行的,尽管六个月后“恰逢”经济衰退,减税起到了刺激经济的作用,但显然不是自觉的正确的反危机政策;另一方面,错误仍不可避免,如1948~1949年萧条时期,联邦储备局却“配合”萧条,采取了减少货币供给的紧缩措施。直到五、六十年代,凯恩斯主义“新经济学”作为一个各理论环节相互联系的有机体系,不仅为经济学家们普

遍接受,也正式被政府采纳,成为确定政策的理论依据,情况才有了变化。近几十年来尽管在采取(或不采取)什么样的理论或什么政策更好的问题上争论很大,但一般认为60年代以来的政策没有出现过“方向性”的错误。特别是60年代,各种有利因素凑到一起,“新经济学”的政策成效显著,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高兴得一时有些忘乎所以。萨缪尔逊声称由于有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和以它为依据的政策,经济危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索洛则称宏观经济学“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高兴并非完全没有道理,60年代应该说是西方国家经济史上第一个较为自觉地执行有较充分理论依据的经济政策的时期,这无论如何是一个社会进步。这种进步“反馈”到经济学的研究中,则表现为缺乏理论基础的单纯政策分析已不多见;政策分析一般只构成理论研究的延伸或应用;一项新的政策建议,若没有充分、系统的理论论证,便无人采纳。在人事上,则表现为60年代以后美国历届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都由理论造诣很深的经济学家担任,决策过程对他们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

当然,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们的乐观主义并不能持久,因为经济学是永远不会完成的。70年代凯恩斯主义政策失灵,货币主义便大大发展起来;此外,“合理预期”学派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供给学派的理论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也相继问世。但在这过程中,政策的变化却相对较慢。这除了由于原有的理论的影响和束缚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到了70年代,政策对理论的依赖已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若新政策建议后面所依靠的理论还没有成熟到一定程度,有关当局就宁可继续依赖旧的理论,执行旧的政策(尽管由于经济形势所迫有时必须作些小的调整)。因此,尽管70年代通货膨胀一直很严重,但直到1979年,在货币主义、合理预期学派有了相当的发展,他们的许多理论观点也被较普遍地接受的时候,联邦储备局才放弃了传统的以稳定利率为目标的旧政策,改而实行以稳定货币供给为目标的新政策。里根政府当前推行的各项财政政策,实际上早已有人提出过,但若不是最终形成了一套能够自成体系的供给学派理论,出现了“拉法曲线”等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恐怕也不会有哪届政府敢于贸然采取这些政策。这种政策相对于理论的“滞后”,并非全是坏事。一项经济政策,直接涉及国计民生,影响长远,没有经过严格理论论证的盲目的政策,或许能偶然奏效,但造成严重损害的可能性却极大。

经济现实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的实际存在;要使理论更接近现实,就需要不断深化对这一现实

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而一般地说来,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穷尽对现实的各个方面的认识,而只能在某些方面、某些层次上“逼近”现实。因此,理论与现实联系更加紧密的发展过程,也必然是各种学说、各种理论观点之间相互竞争和相互溶合的过程。美国经济理论界各流派之间关系的发展,演变,也正是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五、六十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较为注重对经济现象的“真实”方面的分析,却往往忽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种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的特点,因此引起了弗里德曼等人对它的批判,并导致了货币主义学派的兴起。而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共同的特点都是重视需求方面的分析而忽视供给方面的研究,于是70年代出现了供给学派和强调供求共同决定的各种新古典宏观模型。但所有这些理论或模型,都是从过去的经验事实出发来对各种政策进行分析评价的,而合理预期学派的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则指出了人们还能预先及时地考虑到政府新政策的影响,从而调整各自的经济行为,以致使新政策失效。以上各种理论形成了各种学派,通过相互论战又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但是,如果仅看到这些流派和论战,以至把美国战后几十年的经济理论发展简单地概称之为“流派化”,却并不能反映事情的全貌。各种学派形成初期,论战中自然是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但随着争论的深入,必然会相互影响,最后形成一些大家共同接受的东西,或者出现新旧理论的相互融合。例如凯恩斯主义者最终便接受或采纳了许多货币主义的理论观点;凯恩斯学派的主要领袖人物之一莫迪利亚尼便曾说“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因此,理论的发展,最终并不是表现为流派的论争,而是表现为各流派的相互融合,表现为“共同财富”的增加。美国这几十年各流派争论的结果即表现为:一方面,早年发展起来的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线等凯恩斯主义的诸种理论要素,仍然作为整个宏观理论体系的支柱;另一方面,货币主义、合理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的许多新理论观点,也已成为普遍接受的宏观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美国的经济学家,“门户之见”并非没有,特别是那些流派的领袖人物,自然是竭尽全力维护和保持自己的特色。(而他们共同的、最严重的“门户之见”,还是他们的所谓“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英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之间的门户之见,后者的东西是很少被他们“融合”的。)但那种把某一理论看作“绝对真理”的态度却不多见; (下转34页)

25~30年,宽限期5~8年。对发行债券和股票,也需制订相应的政策,以利于吸引开发水电的投资。在利用国外资金技术方面,对水电应开放直接对外的“窗口”。

3.制订合理的税收和利益分配政策。对发电所在地和售电所在地的税收比例和发、供电利润的分配比例应适当调整,使发电地区和投资者、经营者能得到较多的实惠。

4.制订合理的电价政策。目前电价偏低(平均每度电6.5分),而且电价结构很不合理,峰荷、基荷一个价,不利于电力特别是水电自身的积累和发展,也不利于国家预算外资金投向水电。因此,应当按照价值规律、供求关系和优质优价的原则,制订峰荷、基荷,季节电能和事故备用电量等不同等级的电价。这也是能否实行多家办电,联合办电的关键之一。

5.水电站建成以后与电网建立经济合同关系,并服从电网的统一调度,以求达到水、火电联合运行的最佳经济效益。

**(三)认真制定长远规划,切实加强科研和前期工作** 水电工程,地处深山峡谷,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自然条件较差,工程地质勘探要求很高,必须做到万无一失。特别是大型电站,工程浩大,任务艰巨,技术复杂,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安装,建设周期较长。因此,国家应制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远景规划。长远规划要和五年计划、年度计划密切结合,以保证长远规划目标的实现。

适当增加水电资源勘探费和前期工作费用,

是开展河流规划、科研、勘测设计工作,优选建设项目的重要条件。上级有关部门应予以足够的重视,设法帮助解决。

**(四)加强水电队伍的建设** 水电部门应当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大力推进技术进步,把创新和引进结合起来。目前水电队伍严重老化,应当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搞好人才开发,提高队伍的素质,以适应大规模开发水电的需要。

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加快水电建设。赵紫阳总理1980年10月在听取原国家能源委员会关于能源规划汇报时曾指出:“能源问题,从长远看,我国要把水电多搞一些。这个好处太大了,也是给子孙后代做了一件好事。水电跟煤炭、石油不同,水电是再生能源,不是一次消耗能源,又没有污染,要作为战略措施来搞。欧美各国水电开发的程度都很高。我们国家水能资源这么好,要每年克服一些困难,给水电挤出一点投资,甚至影响一些别的也要上,并把方针政策落实到年度计划上来。十年能有看得见的变化,二十年有个大变化。这是要有个战略眼光的。不能一年一年地迁就眼前困难,把时间耽误了,将来回头一看,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赵总理的这一讲话,十分中肯,切中要害,回过头来看,时间已过去了几个年头,这个问题仍然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我们千万不能再迁就眼前困难,白白耽误时间了。

我们相信,只要认真贯彻赵总理的讲话精神,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合理地进行部署,在不久的将来,就一定能够开创出发展水电的新局面。

(上接16页)对于自己不赞成的理论观点,通常也仅称之为“可替代”的理论。多数经济学家也并不将自己认同于某一学派;尽管事实上每个人都会以某一学派的理论作为自己的主要学术根基,但多数人都更想显得“不偏不倚”,尽量吸取各派的长处来发展自己的观点,以求更全面地说明经济现实。这种态度,可以说正是各种理论得以相互融合的“方法论基础”。在经济学理论的教学,这种态度体现得更为明显。一本教科书,主要部分可以是某一学派的理论,但同时总有相当的章节都正面地介绍、分析其他理论观点。在学校,特别是在研究生的课程中,基础理论课一般也都是讲授当今各种学说,各种理论模型,不仅包括他们的“主流”经济学中的各派,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等“非主流经济学”;高级一点的专业课,则更详细地讲解各种学说。这就使得下一代的经济学家,不仅能有较广的知识,为进一步“创新”打下“博采众长”的扎实基础,而且使他们在起步之初,较少“门

户之见”,从而为各种理论的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创造一个基本的“人事条件”。

美国的宏观经济学仍在发展,尚待解决的疑难问题仍然很多,甚至象实际工资变化规律、投资与利率的关系、政府债券的性质和作用这样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争论了几十年,还不能说有了定论;不少东西都是公认的、写进教科书告诉学生们的“存留疑点”。在局外人看来,他们的整个理论体系当然是存在着一些固有的弊病,也不断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后凯恩斯主义等方面经济学家的批判。这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而本着学习各种经济学理论长处的精神,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不仅可以从他们的理论本身吸取营养,也可以从经济学自身发展的科学性、规律性上去分析他们的理论发展过程,从中学习有益的东西,使我们能更少盲目性,更富有成果地建立、发展起解决我们自己特有问题的经济理论。